

目 录

开明旧事—我所知道的开明書店·····	宋云彬(1)
留英記·····	費孝通(31)
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·····	潘光旦(66)
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·····	林礪儒(109)
沪江大学始末簡記·····	刘王立明(120)
記北平新学联·····	中大榮(136)
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·····	关瑞梧(155)
新华信托儲蓄銀行沿革·····	朱錫祚(167)
从成都商业銀行看解放前金融业的畸形异象·····	米庆云(187)
大成紡織染公司与刘国鈞·····	朱希武(210)
国貨售品所始末·····	紀 华(221)
康有为晚年講学及其逝世之經過·····	任启圣(237)
康南海史料商榷·····	王益知(247)
記北京飯店·····	邵宝元(257)
北京电车公司見聞回忆·····	刘一峰(264)
質疑·补充·訂正	
問證《文史資料选輯》的答見(核訂和补充)·····	徐一士(290)
关于《中村事件真相》的补充·····	谷振寰(298)
关于章嘉代表少数民族的問題·····	郭清德(300)

对《虞洽卿的一生》的补正·····	赵晋卿(300)
对选辑第十七辑、二十辑中三文的几点补正···	范予遂(303)
有关黄白船史料的补充·····	岳星明(304)
对《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》 的两点订正·····	张宣武(306)
有关段英被杀的一点史实·····	永莲香(307)
关于“广德、泗安的防御战”的再加订正和补充···	张宣武(308)
萧忠贞不是改组派北平负责人·····	萧 训(312)
对选辑二十四辑三篇的补充和订正·····	黎照寰(313)
对《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》的订正和补充·····	任启丞(316)
对《护法军政府海军始末》的几点意见·····	陈文会(318)
关于周学熙、杨味云和华新纱厂资料的补充···	夏少泉(320)
对选辑二十四辑的四点补正·····	李文杰(323)
对《张静江事迹片断》的订正·····	许炳堃(324)
“中央农业实验所”创立的经过·····	邹秉文(325)
对《万木草堂回忆》的质疑·····	李文杰(326)

开明旧事

——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——

宋云彬

一 前 言

解放以前，全国有六家大书店，就是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开明书店和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。^①解放以后，正中书局当然不存在了，世界、大东也相继停业，

① 这六家书店，其中五家是民营的，它们都出教科书，平时为了推销教科书，互相倾轧，互相排挤，竞争得很厉害。等到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正式开张，它也出教科书，有官方做后盾，五家民营书店都怕它倚仗政治势力，在推销教科书方面，会不择手段地乱搞起来。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誼提出建议，自己内部先实行休战，团结起来，然后把正中也拉进来，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，合理解决分配销行教科书的问题。商务的王云五和中华的陆费伯鸿都赞成。由陆费伯鸿出面，邀商务、世界、大东、开明和正中的负责人，到南京汤山开了一个会。从此这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。六大书店这个称号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个集团的形成，起初原是五家民营书店借此来束缚官方的正中书局，但实际上却形成了书业托辣斯，从此这个集团以外的别家书店，就休想出版教科书。例如北新书局也是出了几种教科书的，只因陆费伯鸿他们不把它放在眼里，没有邀它参加这个集团，后来北新出版的教科书，销数就微不足道了。

开明书店于1953年跟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
讲到开明书店，它的資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万元，远比不上商务、中华。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。但是，由于它的服务对象的明确，对出版物质量的重視，更由于在政治上沒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，始終坚持中間偏左的立場，所以它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一家比較进步的书店，在六家大书店当中，一般人都把它跟商务、中华看作鼎足而三的。固然，讲到进步性，开明又远比不上生活书店，但生活书店的性质究竟跟开明有所不同，不必强拉在一起作比較。

商务創立于戊戌政变前后，中华創立于辛亥革命时期，而开明則創立于五四运动以后，各有它的历史背景。尤其是开明的产生，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。沒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問題来討論，那么开明书店的創辦人章錫琛先生，就不会因为談新性道德和办《新女性》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館解职，他将一輩子在商务当个編輯；而同时在五四以前，象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，即使办起来了，也不可能发展，更不可能长期存在。現在开明早已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“开明书店”这块牌子不存在了，應該有人把它的历史記下来。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，不够全面，聊供参考而已。

二 从《編者附白》說起

魯迅《集外集拾遺》中有一篇題目叫《編者附白》的短文：《莽原》所要討論的，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問題。前面登那兩篇文章的緣故，倒在无处可登，所以偏要給他挤出。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，作一个結束。这回两篇，是作者見了“《玩

代評論》的答复，而未見《莽原》的短信的時候所做的，从上海寄到北京，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經发表之后了，但其实还是未結束前的話。因此，我要請章周二先生原諒：我便于詞句間換了几字，并且將《附白》除去了。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，便不至于以为我太专断了罢。”《魯迅全集》的編者又加了个注釋：“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5日《莽原》周刊第七期章錫琛《与陈百年教授談夢》和周建人《再答陈百年教授》两文之后。”

驟然讀了这篇短文章，誰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，更誰也不会想到这跟后来开明书店的創立有关系。《魯迅全集》編者所加的注釋，也沒有說明問題，現在我給它疏証一下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商务出版的几种期刊如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說月报》、《妇女杂志》等，都不能不革新內容，以迎合潮流。《妇女杂志》是由章錫琛主編的，特別在1925年1月出了一期《新性道德号》，載有章錫琛写的《新性道德是什么》和周建人写的《性道德的科学标准》。他們认为无论男子或女子，都不妨一个人同时跟两个人以上談恋爱，只要“本人的意志如此而不損害他人时，决不发生道德問題”。这种議論，現在看起来，原不过是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义者的一些陈腔濫調。章錫琛先生也說：他們是从罗素的《社会改造原理》、《到自由之路》，加本特的《爱的成年》和爱理斯的《性的心理研究》等书里“燒酒”来的。可是那时候的新旧卫道者們，却把这种議論看作洪水猛兽，羣起而攻。首先是《晶报》，說他們教坏了青年，接着是《时事新报》的报屁股《青光》，說他們提倡男子多妻，女子多夫。《晶报》和《青光》的攻击，不起什么作用，因为《晶报》是一批“黑幕派”搞的充滿低級趣味的小报，本来不被人重視，而报屁股上的文章也是无足重輕的。可是不久陈大齐也

在《現代評論》(第十四期)上发表文章，題目叫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，硬說他們提倡一夫多妻。陈在当时是个名教授，为胡适等所吹捧，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过文章。他一站出来說話，影响就大了，使得章周两位不得不写文章答复。可是文章寄給《現代評論》，《現代評論》却給它压起来不发表，写信去問也不答复，他們只好把文章抄寄給魯迅先生主編的《莽原》，很快就登出来了。后来《現代評論》(第二十二期)也把章周两位的文章发表了，不过是登在通訊栏里的，同时还登了陈大齐的复信。章錫琛又写了一篇《与陈教授談夢》，周建人写了一篇《再答陈百年先生論一夫多妻》，在《莽原》第七期上发表。

这样一疏証，大家可以明白《編者附白》里讲的是什麼一回事了。

三 《新女性》的刊行和章錫琛的被商务解职

那时候，商务的总編輯是王云五。王云五为了討好《現代評論》派，1925年8月，把章錫琛調到国文部当編輯。从9月份起，另由杜就田主編《妇女杂志》，《妇女杂志》就一变其原来面貌，专门談些怎么样給孩子喂奶和怎么样做鸡蛋糕等等，因此銷数一落千丈。錫琛的同事郑振鐸、胡愈之等都为他抱不平，慫恿他另編一种月刊。經大家商定，取名《新女性》，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，由錫琛的朋友吳覺农出面当主編和发行人，发行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吳覺农的家里。王云五老羞成怒，就在这年年底，送一封辞退信給錫琛，請他“另行高就”。

商务辞退职工，照例給一笔退俸金。錫琛服务十四年，有一二千元退俸金可以拿。振鐸又介紹他在神州女子中学教几点钟

課，他每月有了一定的收入，就拿这笔退俸金作本錢，用妇女問題研究会名义，編印妇女問題研究会丛书，如《妇女問題十讲》、《新性道德討論集》之类。振鐸又把文学研究会的《文学周刊》和文学周刊社丛书交給他們刊行。书愈出愈多，銷路也好，可是几千元的資本感到不足了，錫琛就向他的胞弟錫珊討救兵。錫珊原在沈阳商务印书館分館当會計。他这个人勤儉朴素，积蓄了一点錢，又富于事业性。錫琛向他借錢，他感到自己依人篱下，不是久长之計，就决定辞了职同他老兄合办一家兄弟书店。他在回上海以前，荐了一位叫孙怡生的来管发行事务。1926年8月間，就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挂起一块“开明书店”的牌子来了。

四 从兄弟书店到股份有限公司

那时候的开明，既然是一家兄弟书店，資本少，不过四五千元；工作人員也少，一共不过四五个人。除了章錫琛兄弟而外，担任編校等工作的有赵景深、錢君匋、王謫史（女）和索非等。錢君匋是个美术家，每种书的封面都由他設計，因此开明出版的书有一种独特风格。后来別家书店也漸漸注意到封面設計，但开明确是开风气之先的。索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思想不健康，但年青力壯，干劲十足。他除了看稿、校稿，还要跑印刷厂，有时候还帮助做飯。开明的业务发展很快，不到一年光景，六十号这一幢兼作住宅、宿舍、編輯所、发行所的房子，已經不够展布了，又租了隔壁六十四号的房子。編校方面也添了人，如王燕棠、汪曼之（女）和陈云裳（女）。（她后来改名陈英，解放后在科学院工作过）等。出书的方向也漸漸有所改变，关于妇女問題的书少出了，文学书和青少年讀物增多了，还出版了几种属于数、

理、化方面的中学教科书。此外丰子恺、钱君匋等搞的不少种歌谱，在靡靡之音普遍流行的当时，起了整风作用。而章锡琛设计的《活叶文选》受到学校教师 and 广大读者的欢迎（后面还要详细讲）。《新女性》杂志后来就停刊了。立达学会同人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方光蕙、刘熏宇等编辑的定期刊物《一般》由开明出版。

1928年，由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杜海生、丰子恺、胡仲持、吴仲盐等发起，改组为有限公司，资本五万元。1929年，公司正式成立。1930年增资五万元，1931年增资十万元，1933年增资五万元，1936年又增五万元，共计股本三十万元。经理先是杜海生，章锡琛自任协理。发行所先从宝山路搬到望平街，又从望平街搬到福州路，跟中华书局对面，俨然一家大书店了。

编译所也搬过几次场，先从宝山路搬到兆丰路，再从兆丰路搬到梧州路，租了一家丝厂的大厂房，前面做编译所、总办事处和货房，后面是美成印刷厂。^①编译所长是夏丏尊。主持编辑工作的有叶圣陶、王伯祥等。那时候，开明已经确定以出版中学教科书^②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要方针（直到全国解放，这个方针始

① 开明自己没有印刷厂。美成印刷厂是由章锡琛的小舅子吴仲盐发起的，也是股份有限公司，仲盐是大股东兼经理。这家印刷厂事实上就是开明的印刷厂，专门排开明的出版物，不接别家出版社的印件。只有一次是例外，那就是排瞿秋白同志的遗著《海上述林》，打成纸型，由鲁迅先生托人带到日本去印刷装订。鲁迅先生为了这件事情，亲自到美成去过几次。抗日战争起来，美成全厂被燬，仲盐的家产也搞光了，回到乡里，郁郁不乐，就在抗战时期生肺病死了。

② 开明为了提高它在教科书竞销市场中的地位，于1932年出版过几种小学教科书，其中语文课本，叶圣陶写课文，丰子恺画插图，可称双绝。可惜小学教科书一向被商务、中华、世界垄断着，开明无法跟它们竞销，后来只好不印了。

終保持，沒有什麼改變)。夏、叶兩位先生在青年讀者當中有極高的威信，他們自己編寫的幾種指導青年語文學習的書，給青年們的幫助很大。聖陶是個文學家，也是個很好的編輯工作者。他的那種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，給開明同人做出了好的榜樣。

初期的開明書店，機構小，工作人員不多，都是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，沒有什麼規章制度，也沒有嚴格的分工，完全是手工業作風，裡面充滿一種溫暖的氣氛，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事業興趣性，不斤斤計較工作時間和報酬。剛改組為有限公司的時候，還保持着這種作風，但不久情況就改變了。大約從1933年起，開明開始擬訂各種規章制度，陸續公布。這些規章制度，大部分是從商務那裡抄來的，多數由丁曉先草擬，經會議通過。婢學夫人，學得個四不象。那時候總公司一共只有一百多個工作人員，組織系統卻分為三個處所，一個室，十八個部，三十三個課和四個委員會。職工每天上下午簽到，曠工照扣薪水。還有其他各種章則。這樣一來，過去的那種溫暖氣氛，給一掃而光了。那時候，我已經進開明，我跟錫琛談過，我說這樣做有利也有弊，其弊在容易挫傷同事們的積極性。但錫琛他們的看法跟我不同，據說這樣做完全合乎資本主義發展規律云云。本來呢，為了嚴密內部組織，搞好分工合作，定一些規章制度，也是需要的。但必須結合實際情況，顧到開明的特點，考慮到如何保持那種優良傳統，如何發揚同事們的工作積極性。然而錫琛他們全不考慮到這些，一味看商務、中華的樣。錫琛也沒有想到象叶聖陶為什麼要從商務跑出來，做開明的編輯。當時開明的大多數同事，對錫琛他們這種搞法是有反感的。不久，聖陶就

在他的故乡苏州盖了几间房子，全家搬了回去。他虽然没有脱离开明，但不是天天上班，一个月只来上海一两次了。

随着业务的开展，机构的扩大，各地分店的增设和人员的添加，也给开明带来了一些困难。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。大概也是一种规律吧，出书愈多，营业愈发展，愈加感到钱不够。开明没有自己的印刷厂，不能用机器向银行押款。调度款子原是经理杜海生的责任，但后来杜海生辞职了，由章锡琛当了经理。锡琛原是搞编辑的，跟金融界不曾打过交道，因此又请了一位范洗人当协理。范虽然有办法调点款子，但是不多。所以当时开明表面虽然生意兴隆，内部却在天天过年卅夜。再加当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，更是一种棘手的事情。开明先后出版了好几十种中学教科书，这些教科书必须经当时的教育部审定，才得发行，那就不得不跟南京的官方虚与委蛇。开明出版的文学书，如茅盾、巴金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创作，以及翻译的高尔基的作品等等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，都是非常讨厌的，总要用种种方法来刁难。茅盾的《子夜》就受到过刁难，以致不得不在第二版作了一些删节。还有两种定期刊物，《中学生》和《新少年》，常常要受到所谓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的刁难。因此，当经理的人又不能不跟上海的官方虚与委蛇。这些应付极不容易，自己必须有一条界线，突破了这条界线，那就无异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。我记得有两桩事情，开明应付得相当好。一桩是沈端先（即夏衍）译的高尔基的《母亲》被禁售，他们把“孙克瑞”改为“沈瑞先”，《母亲》改为《母》，仍然继续印行。一桩是郭老（郭沫若）的《离骚今译》，里面有“党人之媮乐”一句，审查老爷认为是暗骂国民党，不给通过。章锡琛就质问他们：“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？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，只

好通过(但出版以后，他們还是在暗中查禁)。

而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

五 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后的开明书店

抗日战争爆发，开明总厂被燬，资产损失达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开明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章锡琛和夏丏尊，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不关心时事。因为不关心，对时局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。丏尊不相信会出现长期抗战的局面。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：“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，没有认真跟帝国主义者打过一次仗，目前这个坏政府，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。”(我觉得夏先生这句话只说对一半。他看透了蒋介石不会真正抗战，却没有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全国人民同仇敌愾，坚决要求对日抗战，蒋介石为形势所迫，不敢公开降敌，就有打起来的可能。)锡琛呢，他虽然不是绝对不相信会打起来，但他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，以为梧州路是租界，即使打起来，也不会在租界中作战。他还有一种奇怪想法，认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关头，我这点小小事业算得什么。有一次我问他开明作了什么准备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章夏两位警觉性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事先作了相应的布置，开明的资产损失不会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8月10日，南京的“教育部”召集上海各书店经理到南京去开会，宣布战争不可避免，要各家赶快把机器和各种重要物资搬离上海，说政府已经在武昌安排设厂地点，还拨定了运输船只，叫各人回去立刻动手搬。他们都信以为真。章锡琛第二天回到上

海，就准备搬动。但那时候上海所有企业和居民都忙着搬场，运输车辆非常缺乏。开明自己没有一部汽车，靠临时雇大车搬货，一天搬不了多少，拆卸机器更加无法，只得听天由命了。可憐美成印刷厂的大股东吳仲盐，他的全部家产差不多全搁在这个厂里了，他哭丧着脸对我说：“机器搬不动，要搬也得花上万把块钱，美成没有这笔现款，只好听天由命。炮声一响，我准备坐在机器旁边，跟机器共生死！”

“八·一三”炮火响了。开明响应国民党的号召，准备迁往武汉。国民党原来答应给他们准备好运输船只，可是等到要搬的时候又推说运兵忙，没有船只可接，经过许多的争吵，总算弄到了两条船，分两批开走。第一批运的是纸型、书籍和纸张，先用民船从内河运到镇江，在镇江上英国轮船运汉口，总算安全到达。（押运这批纸型和书籍的是许志行同志，他在从上海到镇江的半途奔牛地方，遭到敌机轰炸，差一点送了命。）第二批运的几部机器（向美华印书馆借的），还有纸型、书稿、纸张、油墨等等，没开航，就被日军劫走了。章锡琛亲自到武汉去布置一切。那时候南京政府在武汉设有办事处，但什么都没有准备，要他们实践在南京时的诺言，毫无办法。锡琛天天到办事处去交涉，别家书店也派人在武汉，也天天去交涉，大家都气破肚子，不再相信蒋政府，认为武汉也一定要放弃。锡琛接到第二批货物被敌人劫走的消息，又接上海电报，说店屋因欠房租，房东已经起诉，要遭封闭，他就回上海了。从此他就住在上海，直到抗战结束。夏丏尊也一直住在上海。日寇侵入租界后，他们曾经给敌人抓去关过十多天，靠内山完造（日本人，内山书店的老板）援救，才放出来。

淞沪之战坚持了三个月，不久南京淪陷，南京政府搬到武汉，长期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了。那时候，叶圣陶全家迁重庆，范洗人和章錫珊也到了重庆。我和同事傅彬然，战争一爆发就离开上海，各回自己的家乡。后来我和彬然都参加郭老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。武汉淪陷，我们都到了桂林。那时候，所谓“文化人”大部分聚集在重庆和桂林两地。上海的科学印刷厂也搬到了桂林，桂林的印刷条件比重庆好，我们向开明建议，先把《中学生》恢复起来，改名为《中学生战时半月刊》，叶圣陶主编，彬然和我做实际编辑工作，于1939年5月在桂林复刊。后来章錫珊、范洗人先后到了桂林，在桂林设开明总办事处，范洗人当总经理，重新组织董事会，我和彬然都被选为董事。但事实上我们早已脱离开明，我和彬然都参加了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工作，跟开明的关系只不过藕断丝连而已。1943年，彬然重回开明，离开桂林，到了重庆（开明编译所在重庆，由叶圣陶主持）。我仍留在桂林。下一年8月间，我狼狈地带了家眷从桂林逃到重庆，后来又昆明待一个时期，1945年10月间又回重庆。1946年2月间，开明总处全部由重庆迁回上海，我因为跟开明已经毫无关系，没有回上海，到桂林转了一趟，又到武汉，再转香港。那时候桂林文化供应社也迁香港，我还是给文化供应社做点工作。1949年2月间，圣陶和彬然都从上海来香港，我们同坐轮船到烟台，由烟台转北京，参加教科书编审委员会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）工作。上海是1949年5月间解放的，不久，开明的朋友们如范洗人、章錫琛兄弟和王伯祥等先后来到了北京。那时候，夏丏尊先生已于三年前去世，錫琛事实上也已经脱离开明。我对那时候的开明的情况，不甚了了，只记得1950年出版总署批准开明书店与国家合

作，他們召开过一次干部會議，向出版总署作了报告。到1953年4月間，开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，“开明书店”这块牌子就不存在了。

六 两本暢銷书《爱的教育》和《开明英文讀本》

开明书店有两本暢銷书，一本是夏丏尊譯的《爱的教育》，还有一本是林語堂編的《开明英文讀本》。

《爱的教育》原著者意大利人爱米契斯(E. Amicis)，讲感情教育，也有点爱国思想(爱米契斯的教育思想是不健康的，这儿且不作批評)。夏先生从日文轉譯，陸續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，后来編入文学研究会丛书，由商务作为版稅书印行。夏先生在报上看到《爱的教育》出版的广告，兴致勃勃地跑到商务总发行所(門市部)去买，买不到。問为什么报上已見广告而书却买不到。店員傲慢地回答說：“我們这几书可多哩，誰知道！”夏先生气极了，就要跟商务解除出版契約，又怕商务不答应，先要求把著作权出让，故意提高价格为二千元(約每千字二十元，这是当时所沒有的高价)，商务当然不答应，商定到初版卖完为止，取消契約。他就把这本书交給开明出版。哪里想得到，这本在商务滞銷的书，到了开明书店，竟会銷数大增，各地小学校都采用作課外補助讀物，十多年中，印了将近一百版吧，夏先生前后得到的版稅，超过了他向商务要求的稿費十倍以上。所以虽然只是这么一本书，却跟开明的业务发展大有关系。

普通一本书，無論銷路怎么样好，总不及教科书，所以书店从来不肯让教科书的編者抽版稅。但商务却有一个例外，周越然編的《模范英文讀本》是抽版稅的。周越然原想卖稿給商务，商务

不肯出高价，允許他作为版稅书出版。不料一出版，全国絕大部分中学校都采用，周越然陸續抽得几十万元版稅，他就盖洋房，买古书，面团团作富家翁了。林語堂看了眼紅，也想編一本来搶周越然的生意。現在大家都知道林語堂是个极端反动的家伙，但在那时候，他的反动面目还未完全暴露，他原是北大教授，跟魯迅先生和孙伏园先生等都有往还。1927年，他在武汉政府外交部当秘书，武汉政府垮台以后，他准备在上海作寓公，不愿再当教授，也不愿干別的工作，想編一部中学英語課本，象周越然那样，靠抽版稅起家。他就托伏园代向书店接洽。伏园当时最接近的书店，只有北新书局、开明书店两家。他先跟北新接洽，因为林語堂提出的条件是双方訂立契約后，每月預支三百元，将来在版稅当中分期扣还，北新当然不能答应。他又去向錫琛試探，以为会同样落空，不料錫琛居然一口答应了。那时候开明的資本不过四五千元，每月營業額至多也只有四五万元，答应每月支出三百元的預支稿費，不能不說是带有一点冒險性的。听說为了这件事，錫琛的老弟还跟他鬧过一場呢。最近伏园跟我讲起这件事，他說当时林語堂对他說：“章先生既然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我决定在上海住下来。”他就在靜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，买家具，装电话，还买了一部汽車。这儿附带說明一下伏园跟开明的关系。伏园跟錫琛同学兼同乡，开明的創立，伏园帮了不少忙，最初挂在宝山里外面馬路上的那块牌子，还是伏园写的字。

林語堂在着手編課本之先，每周在上海的英文《字林西報》上发表文章，批評現行的各家的英語課本，把它們批評得體无完肤。这是一种极巧妙的宣傳方法。他又托錫琛請丰子愷同志給課本画插图，允許从自己版稅中分出百分之二的數額給子愷。林語

堂本以精通英文有名，他編的課本，確有他的特色，配上手繪的插图，真是耳目一新；而开明的出版物十分讲究装帧，前面已經讲过了。因此，林編《开明英文讀本》一出版，中學校紛紛采用，不到几年，几乎把商务的周編《模范英文讀本》給挤掉了。这个課本繼續发行二十多年，林語堂得到的版稅总在三十万元左右。这对于开明的发展，当然有很大的帮助。

錫琛按照資本主义經營方式搞出版事业，确是有一手的。他气魄比較大，眼光比較远。有人对他說笑話：“听说从前夏粹芳初搞商务的时候，資本很少，后来張菊老（張元济）为戊戌政变受牽連，避在上海，跟夏相識，夏就每月送三百元給張菊老，請他主持編譯事务。你的魄力和眼光，倒跟夏粹芳一样大，一样远！”这当然是說笑話，林語堂怎么可以跟張菊老相提并論！不过說錫琛跟夏粹芳一样有气魄，有眼光，那倒不能說是笑話。可笑那个林語堂，他得到許多版稅，做了开明的大股东（我記得他投資一万元），到1936年，开明要增資，錫琛請他再认一点股，他对錫琛說：“对不起，我近来特別对鈔票感兴趣，我想积十万現鈔，对投資这桩事情不感兴趣了。”林語堂就是这么一类人物。而事实上，那时候他的反动面目已經暴露，自封为“幽默大师”，反对革命，反对共产党，魯迅先生也在写文章呵斥他了。

七 开明书店跟世界书局的爭訟

林編《开明英文讀本》几乎成了开明书店的命根。不料1930年，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，請林汉达同志編了一本《标准英語讀本》。林語堂見了，认为《标准英語讀本》的形式全跟《开明英文讀本》相同，而且有不少課文是从《开明英文讀本》搬去的（其实林語

堂也不想一想，他自己編的課本，有不少文学故事，也不是从外国課本里搬来的嗎)，就要錫琛向世界办交涉。其实当时各家出版的教科书，原多东抄西撮而成，說不上誰抄襲誰，至于形式的类似，更不成問題，談不上侵犯著作權。記得方光蕙同志对我說过，林汉达編的課本也有它的特点，并不比林語堂的差。也許林語堂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怕世界的英語課本一銷开，会减少他的版稅收入，覺得非慫恿开明跟世界办交涉不可。那时候世界的編輯徐蔚南，跟开明夏章两先生相当熟，他們就請徐轉达沈知方，要求停止出版，实行改編。沈知方当然不卖帳。开明就請他們的法律顧問袁希濂律師写信給世界，提出严厉警告，认为《标准英語讀本》侵犯他們的著作權，要求停止发行并賠償損失。沈知方接到信，沒有叫徐蔚南去跟开明接触，却把那封律師信交給林汉达，要他个人去負責解决。这是一个难题。汉达大学毕业不久，一个年青小伙子，初出茅庐，毫无經驗，要他直接去跟那老奸巨猾的林語堂办交涉，怎么成呢？当时世界书局有个名义上的編輯所长范云六（实际主持編輯工作的是徐蔚南），是个老实人，他建議林汉达直接去找章錫琛談，并且愿意写介紹信，因为他曾經跟錫琛在商务同过事。林汉达拿了介紹信去看章錫琛。錫琛見信中有“敝局出版之《标准英語讀本》与貴店《开明英文讀本》有雷同之处”的話，大为高兴，因为“雷同”一語給他抓住了話柄。他对林汉达表示，这封律師信本来出自林語堂的主張，只要林語堂愿意和解，他自己沒有什么意見。就写了張条子，請汉达去看林語堂。汉达一連去了三次，头两次林語堂摆架子不見他，他只好留下一張名片，在名片后面写上几句話，大意說，来了两次見不到你，那个課本你认为哪儿处应当修改，請告訴我，我愿意接